

文革中的黃皮書和灰皮書

• 宋永毅

文革大批判的盛行，掃蕩了封、資、修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間，這空間單靠「毛澤東思想」是填不滿的。而十七年正規教育的戛然停頓，更為時值15-25歲的一代人騰出了成年累月的自學時間。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燒掉所有的圖書館，由於抄家、父母被囚禁、紅衛兵掌管了圖書館等種種原因，不少文革前非正式出版的、專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讀物」，也開始流落到他們子女及一般青年學生手裏。擺脫了父母師長的管束，他們在書中尋找完全屬於自己的答案。

文革中的地下讀書運動，一開始便呈現出與十七年單一刻板的共產主義教育大相逕庭的系統化和異質化的特點。這裏，前者是指這一代人千方百計地偷嚐「禁果」，在現代西方所謂的「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化中汲取精神營養；後者則是指他們開始系統地學習馬列著作以及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來源有關的黑格爾、康德等人的德國古典哲學著作。在文革思想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灰皮書」、「黃皮書」，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登場，並在一代人的思想旅程中催化了精神核裂變的。

60年代和70年代，中共兩次較大規模地出版過「內部讀物」。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蘇論戰期間，中共為了使各級幹部在「反修鬥爭」中擴大視野，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有計劃地出版了一批國際共運中各種思潮流派（或稱「修正主義」思潮）和他們認為有助於了解蘇聯修正主義、西方資本主義的著述及文藝作品。第二次是70年代初期，隨着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中蘇關係的緊張和中美關係的解凍，「四人幫」一夥也不得不鬆動了一下水泄不通的出版界，開始舉辦《摘譯》（1973-1976），介紹國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潮及文藝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參閱和批判」的蘇修理論和文藝作品，以及和中美關係有關的歷史傳記等。自然，久遭禁錮的中國出版界知識份子也抓住了這一天賜良機，盡可能地去譯解異域文化。原商務印書館的老編輯柏元等人於1973年準備重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灰皮書」便是很典型的

中共兩次較大規模地出版過「內部讀物」。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蘇論戰期間，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有計劃地出版一批著述。第二次是70年代初期，「四人幫」舉辦《摘譯》介紹國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潮及文藝作品。

根據統計，1949年至1986年這37年中全國共出版「內部書籍」18,301種，其中屬社會科學方面的有9,766種之多，而屬於西方理論和文學的著作則約有2,000種。這些書籍便成了一代人與世界溝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資源。

一例^①。根據權威性的工具書《全國內部發行讀書總目1949-1986》^②的統計，這37年中全國共出版「內部書籍」18,301種，其中屬社會科學方面的有9,766種之多，而1976年文革以前出版的有差不多4,000種。除去大量的馬列、毛澤東著作外，文革前出版、屬於西方理論和文學的著作約有1,041種，而文革中則出版了近1,000種。由於當時中國完全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這些書籍便成了一代人與世界溝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資源。根據各種當事人的回憶、訪談，下列的「內部讀物」對文革一代人的思想曾發生極大影響：

(1)《被背叛了的革命》，列夫·托洛茨基著，柴金如譯（北京：三聯書店資料室編印，1963年12月）

(2)《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密洛凡·德熱拉斯著，陳逸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2月）

(3)《斯大林評傳》，列夫·托洛茨基著，齊幹譯（北京：三聯書店資料室編印，1963年10月）

(4)《赫魯曉夫主義》，特加·古納瓦達納著，齊之思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11月）

(5)《南共綱領和思想鬥爭「尖銳化」》，維利科·弗拉霍維奇著，林南慶譯（北京：三聯書店，1964年2月）

(6)《斯大林時代》，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4月）

(7)《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尼·謝·赫魯曉夫著，陳世玉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10月）

(8)《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跡史》，拉扎爾·皮斯特臘克著，北京翻譯社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4月）

(9)《西行漫記》，埃德加·斯諾著，王廠青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2月）

(10)《法國大革命史》，馬迪厄著，楊人緬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7月）

(11)《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威廉·L·夏伊勒（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12月）

(12)《歷史研究》，湯因比著，曹末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

(13)《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Adam Schaff著，林波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11月）

(14)《人的遠景：存在主義，天主教思想，馬克思主義》，R·加羅蒂著，徐懋庸、陸達成譯（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8月）

(15)《杜魯門回憶錄》，哈里·杜魯門著，李石譯（北京：三聯書店，1973年9月）

(16)《通向奴役之路》，F.A. 哈耶克（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4月）

(17)《人，歲月，生活》(1-3)，愛倫堡著，王金陵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964年）

- (18)《解凍》，愛倫堡著，沈江、錢誠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 (19)《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索爾仁尼津著，斯人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2月)
- (20)《厭惡及其他》，讓·保爾·薩特著，鄭家璧譯(上海：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1965年4月)
- (21)《局外人》，亞爾培·加繆著，孟安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年12月)
- (22)《麥田裏的守望者》，傑羅姆·大衛·塞林格著，施咸榮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
- (23)《等待戈多》，薩繆爾·貝克特著，施咸榮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5年7月)
- (24)《憤怒的回顧》，奧斯本著，黃雨石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2，1月)
- (25)《在路上》，傑克·克茹亞克著，石榮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12月)
- (26)《〈娘子谷〉及其他》，葉夫吐申科等著，蘇杭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
- (27)《帶星星的火車票》，瓦·阿克肖諾夫著，王平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
- (28)《生者與死者》，康·西蒙諾夫著，謝素台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12月)
- (29)《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日記》，切·格瓦拉(北京：三聯書店，1971年12月)
- (30)《尼克松其人其事》，復旦大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上海直屬機關「五七」幹校編譯組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
- (31)《多雪的冬天》，伊凡·沙米亞金著，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
- (32)《落角》，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
- (33)《你到底要幹甚麼？》，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
- (34)《普隆恰夫經理的故事》，維·李巴托夫著，上海外語學院俄語系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10月)
- (35)《人世間》，謝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 (36)《白輪船》，欽吉斯·艾特瑪托夫著，雷延中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
- (37)《選擇的必要》，亨利·基辛格著，國際關係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11月)

「灰皮書」中的西方歷史書籍，例如《西行漫記》、《杜魯門回憶錄》、《尼克松其人其事》、《選擇的必要》等，使久受謊言的迷霧蒙蔽的青年人忽然間洞察了歷史真相。

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覺醒中的紅衛兵們對這些「灰皮書」和「黃皮書」情有獨鍾？其實，只要注意上述書籍的作者陣容，便不難回答這一並不複雜但又意蘊深長的提問。托洛茨基、赫魯曉夫、德熱拉斯、愛倫堡、索爾仁尼津、西蒙諾夫……等，幾乎無一不是聞名中外的所謂國際共運中的「叛徒」或「修正主義作家」。他們曾都是狂熱的革命中人，但又幡然醒悟為「革命」的懷疑者與反對者，這一思想歷程和文革一代人正好相似。曾是革命的「同志」，他們的話語系統也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這些作品的主要特點都在揭露共產主義輝煌理論與現實中骯髒的專制和陰暗的權力鬥爭，尤其是對斯大林大清洗內幕的揭露和對人性、人道的「解凍」的呼喚，更觸發了紅衛兵們的強烈共鳴。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更骯髒、更陰暗、規模更大的斯大林式大清洗，這一代人在其親身經歷中深切地體會到中共革命理論的虛偽，更廣泛地目擊了、承受了這一「革命」的黑暗與殘酷。因而，當他們閱讀這些「叛徒們」對「革命」的認識時，就不僅是「心有靈犀一點通」，而且彷彿是人生大徹大悟。一位曾在河北白洋澱地區插隊的原北大異端思潮「共產青年學會」讀書圈子成員，後來回憶道：「那時，我們狂熱地搜尋文革前出版的『灰皮書』和『黃皮書』；我的一個初中同學的父親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藝部門的領導，我在她的家裏發現了數量頗豐的一批『黃皮書』。記得當時對我有啟蒙意義的書是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經歷了一個全面的壓迫和苦難，我們的精神陷入了一種困惑。而最終使我們衝破十幾年教育的灌輸給我們的思想模式，得益於兩本『灰皮書』的點撥，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氏的書無疑是困惑之中出現的一縷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熱拉斯的《新階級》。至此，有關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我們終於擺脫了夢魘般的桎梏和愚昧。」^③此外，這些「灰皮書」中的西方歷史書籍使久受謊言的迷霧蒙蔽的青年人忽然間洞察了歷史真相。例如，《西行漫記》在無意中使人窺見「偉大領袖」的風流情史；《杜魯門回憶錄》使他們知道了朝鮮戰爭的另一種說法；《尼克松其人其事》、《選擇的必要》等有關西方領導人的傳記與理論著作，第一次使紅衛兵們感到這些領袖的面目並不是那麼猙獰，而是頗具事業心、靈活性和人情味的。十七年來，他們對中共及其體制的盲目信仰，是建立在中共對另一種體制的絕對醜化的基礎上的。在極端封閉的環境中，由於無法比較而使他們容易輕信諸如「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和「極端腐化墮落的西方世界」等等宣傳，這些說法也自有其道德的感召力。這些書在當時就正好提供了一個可供比較和思考的機會。另外，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就更難不震撼覺醒中的紅衛兵們的魂魄，因為法西斯的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何其相似！一位哲學系教授回憶他在文革中讀到此書時的感受，他一下子聯想到文革同法西斯運動，兩者都走着一條「人民如癡如醉的擁護」的「毀滅之路」……「真可謂：要讓一個民族滅亡，先叫它瘋狂」^④。正如後來被打成上海第一大反革命案——「復旦大學胡守均小集團」（其實僅是一個鬆散的讀書會而已）的頭頭周谷聲所言：「對於正處在覺醒中的我們來說，看了這樣的書還不從國家體制上去懷疑，去思考問題，已經不可能了。」^⑤

在上述書單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為數不少的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厭惡及其他》、《憤怒的回顧》、《局外人》、《麥田裏的守望者》等——對這一代人也發生了不小的影響。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的文學所表達的思想傾向，主要是在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外部物質世界和人與自我四種關係上的全面扭曲和嚴重異化，以及由之產生的精神危機和創傷心理。出現在「垮掉的一代」、「憤怒的一代」作品中的叛逆之子們，面對傳統的道德信仰的崩坍所表現出來的懷疑、悲觀、絕望和反叛，和在文革中被利用後又被放逐的一代青年的處境、心境都十分相似。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社會造成的上述四種關係的全面扭曲和嚴重異化，恐怕比西方世界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樣處於精神危機中的青年人產生惺惺相惜之感，異質的酵素更催發了他們的省悟。至於林林總總的西方現代哲學——從薩特的存在主義、湯因比的歷史哲學到哈耶克的「絕對的權力就是絕對的腐蝕」論——都對打開年輕人的思想的閘門十分重要，使他們的思想趨向多元。

除了上述的「灰皮書」、「黃皮書」外，另一類由紅衛兵自己油印、手抄的地下讀物也不容忽視。國內女學者陳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記述老紅衛兵的創立者與聯動思潮的倡導者們在插隊落戶期間組織「讀書會」學習的情景：「後來我回北京，其間讀了毛主席的《讀〈政治經濟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第三版）的筆記》，吉拉斯的《新階級》、《赫魯曉夫傳》、蘇共20大報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其他人——引者注）已經把馬恩選集前22卷從頭過了遍。同時，我還翻閱了1957年的所謂右派言論，向黨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論和斯大林的《論黨內反對派》甚麼的。給我震動比較大的是《新階級》、斯大林的黑幕，赫魯曉夫蘇共20大報告引起的經久不息的掌聲，還有『解凍』所帶來的影響……看了七千人大會講話後，有一種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覺……又把所謂彭德懷的反黨意見書翻出來看，在農村呆了幾年之後，就覺得太是這麼回事兒了。而且覺得份量並不那麼重，是那麼的客觀、那麼謹小慎微。尤其是還看到所謂大右派林希翎向黨交心材料，給我印象很深。」與此同時，他們還「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叫《新思潮》。同時搞建設，搞學習」^⑥。這裏，「赫魯曉夫蘇共20大報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彭德懷的反黨意見書」等都是流行一時的油印地下讀物。當這些紅衛兵們自覺地把自己的思緒延伸到「右派」—「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國際共運中的修正主義頭目」等等的思想脈流裏去時，他們完全用反「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思想」以外的思想，去自覺地重構他們駁雜的思想體系。這種自覺，正呈現出他們從感性抵制文革過渡到理性反抗的精神軌迹。

比「灰皮書」、「黃皮書」更廣泛地流傳於這一代人的讀書圈中的，是文革前出版的數百種西方和俄國的古典文學作品。如果說前者使他們擺脫「革命」價值體系的桎梏，那麼後者便幫助他們重建人性、人道情感的世界。在公開發表的數百種關於紅衛兵和知青生活的回憶錄中，下列一些古典名著和人物形象不時被提及：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裏的拉赫美托夫；屠格涅夫《羅亭》中的羅亭；《貴族之家》裏的拉夫列斯基；《前夜》裏的英沙羅夫；托爾斯泰《戰爭與

比「灰皮書」、「黃皮書」更廣泛地流傳於這一代人的讀書圈中的，是文革前出版的數百種西方和俄國的古典文學作品。如果說前者使他們擺脫「革命」價值體系的桎梏，那麼後者便幫助他們重建人性、人道情感的世界。

1968年秋，在上海市重點中學上海中學造反派紅衛兵的讀書圈中，爆發過數次關於雨果的《九三年》和齊瓦尼約利《斯巴達克思》的爭論。通過一次次推心置腹的討論，絕大多數的紅衛兵拋棄了他們出生以來便被灌輸的「階級分析法」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從而回歸到「人的本身」。

和平》裏的安德烈·保爾康斯基；狄更斯《雙城記》中的卡爾登；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多夫》中的主角；司湯達《紅與黑》裏的于連；雷馬克《凱旋門》裏的法國醫生雷維克；齊瓦尼約利《斯巴達克思》筆下的奴隸統帥和雨果《九三年》中的郭文將軍……等等。這些作品的共同歷史背景往往是英國革命、法國革命或俄國革命，這一組人物形象——革命者，愛國者，個人奮鬥者——相似的性格特徵，如他們常常是嚼火不息、堅韌不拔卻又充滿了人道主義和人性的情感。這些作品對革命的陰暗面、殘酷性也都有相當的揭露。在另一方面，又歌頌了這一顆顆永遠騷動不安的理想主義靈魂、人道主義的情懷及他們的悲劇命運。對處於文化大革命中的這一代人來說，這些作品對革命陰暗面的揭露引起了他們的共鳴；對理想主義的執着激勵了他們的苦戀；對人道主義、人性美的不倦追求，更激起了他們深長的思考。1968年秋，在上海市重點中學上海中學造反派紅衛兵的讀書圈中，爆發過數次關於雨果的《九三年》和齊瓦尼約利《斯巴達克思》的爭論。其焦點之一是：身為革命軍將領的郭文是否應當私自放掉貴族叛亂頭子朗特納克侯爵？後者是為了從火中救出三個小孩而被捕的。焦點之二是：身為奴隸軍統帥的斯巴達克思，是否應當和奴隸主的遺孀范萊里雅有那種卿卿我我的愛情關係？通過一次次推心置腹的討論，絕大多數的紅衛兵拋棄了他們出生以來便被灌輸的「階級分析法」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把全部的同情都傾注向這兩位革命將領——郭文和斯巴達克思那一邊^⑦。從而，他們告別了簡單狹隘的思維方式和鬥爭哲學，回歸到「人的本身」。這一代人的人性就是這樣開始復蘇的，使他們具有那個特定年代的現代意義上的稟賦氣質。

註釋

- ① 柏元：〈「莫向資產階級檢破爛！」——一段枯燥無味的往事〉，《讀書》（北京），1992年2月。
- ② 中國版本圖書館編：《全國內部發行讀書總目1949-1986》（北京：中華書局，1988）。
- ③ 潘婧：〈心路歷程——關於「文革」中的四封信〉，《北京之春》（紐約），1995年1月。
- ④ 高瑞泉：〈不要怕上帝發笑〉，載金大陸編：《苦難與風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81。
- ⑤ 1996年9月對周谷聲的訪談錄。
- ⑥ 陳小雅：〈北京知青歷程回眸〉，載余夫、汪衛華編：《悲愴青春：中國知青淚》（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頁13-17。
- ⑦ 1996年10月筆者對原上海市上海中學一批造反派紅衛兵的訪談錄。